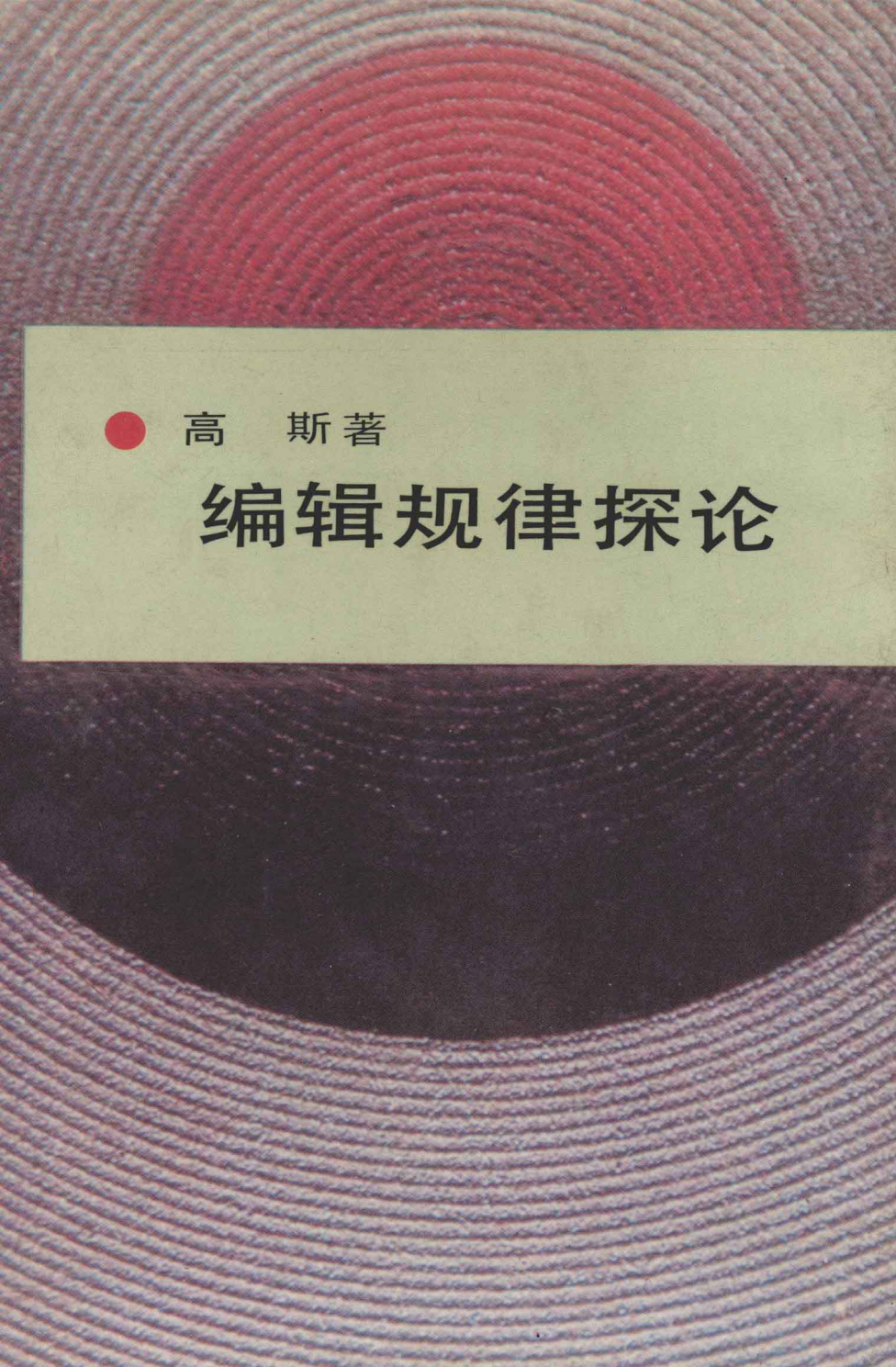




● 高 斯 著

编辑规律探论

(苏)新登字第003号

编辑规律探论

高 斯 著

责任编辑 缪詠禾

出版发行：江 苏 教 育 出 版 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 苏 省 新 华 书 店
印 刷：江 苏 新 华 印 刷 厂
(南京中央路145号, 邮政编码：210009)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6.625 插页 10 字数 642,600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 册

ISBN 7—5343—1566—2

G · 1385

定价：18.40 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

——李大钊

《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

（《李大钊选集》505页）



第一篇

前提与概论

目 录

第一篇 前提与概论

第 一 章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	辑学	1
第 二 章	研究图书编辑规律	、想	31
第 三 章	研究图书编辑规律	——“编辑工程”	62
第 四 章	图书编辑与政治		90

第二篇 古代图书编辑事业 1.迹

第 五 章	反映在社会文明进程中的延续作用	141
第 六 章	决定文化传统积累过程的凝聚功能	199
第 七 章	从长期实践中提炼的基本原则	269
第 八 章	古代图书编辑事业的学术结构	329

第三篇 近代图书编辑事业的大转轨

第 九 章	近代进步图书编辑事业的演变	375
第 十 章	辛亥革命前后的新型图书编辑事业	434

第四篇 革命图书编辑事业的发展壮大

第十一章	图书编辑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开路	475
第十二章	革命图书编辑事业的崛起	524
第十三章	在两个战场展开革命斗争	557
第十四章	革命图书编辑事业的发展成熟	610
第十五章	近现代历史传统的回顾与概括	698

第五篇 社会主义图书编辑事业的曲折与成就

第十六章	四十年成就与经验教训	723
第十七章	地方出版事业的振兴与发展	767

第六篇 新形势下的图书编辑意识

第十八章	从主体地位出发的责任意识	783
第十九章	提倡质疑精神的审读意识	806
第二十章	以优化选择为目标的决策意识	819
第二十一章	突出提高效率的管理意识	833

后记	847
----------	-----

第 一 章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编辑学

一 图书编辑——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

中国图书编辑工作究竟有没有规律可言，究竟可能不可能成为一门新的学科？这些年的许多材料已经可以证明，回答是肯定的。无论从我国图书编辑事业的历史发展状况看，或者是从建国以来40年社会主义图书编辑事业的发展状况看，图书编辑固然隶属于出版事业这一大系统，但它本身却又从来就是一项自成系统、自有规律的学术性很强的事业。从事这一事业的每一名图书编辑工作者，他的业务实践是一项独立性很强，必须运用创造性思维进行复杂的高级脑力劳动的工作。有人以为图书编辑工作者为著述者和读者服务，因而以为编辑活动无足轻重，这是一种可笑的偏见。图书编辑工作有没有“学问”可言，不决定于服务性是怎么样的性质及其作用的意义，而决定于这一工作是否具有构成系

统的运动规律。今后的研究成果将会明白无误地回答那些偏见论者，确确实实，图书编辑工作大有学问可言。

如果说，80年代以前，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原因，我们未能及早或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开展图书编辑学的研究工作；那么，80年代以来初步开展的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可喜的，宝贵的。至今全国已经有了近百部有关图书编辑的著作和几千篇论文。然而，这个成绩和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图书编辑学，还有相当的距离。我们的科学研究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尤其要看到，正因为我们断定图书编辑大有学问可言，要通过研究使之成为一门拥有理论体系的专业学科，实在很不容易。从总体讲，至少涉及到三个方面，即关于中国图书编辑事业从古到今发展历史的研究，关于图书编辑事业若干基本规律的研究，以及关于图书编辑事业各项实践活动的业务规律的研究。这三个方面，还都有内在的联系，都包含着纵横交错的复杂的各种关系。这就决定了，科学研究的每一点进展，都必须付出强度很高的艰巨劳动。

我们应该积极而又坚定地开展有关图书编辑学的科学研究工作，从纷繁复杂的实践经验中探究各种有机的必然性，加以理论概括，那么，前进的速度是不会很慢的。

图书编辑、出版事业是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确切地说，是古代人类社会出现了文字，人们用文字来记录各种自然变化和社会活动（包括人们的思想交流）之后的必然产物。当人们用文字通过某种载体记录了各种自然变化和社会活动，并意图保存和传播这种纪录，从而产生了原始的“图书”的时候，图书编辑工作也就产生了。不管这种古代的图书如何简单粗陋，处于雏型的阶段，它必定要经过一种加工处理的过程，才能达到保存与传播的目的。这种加工处理也可说是最初的“图书”编辑过程。

从中国古代汉字“书”和“编辑”的字义来考察，可以说明这一点。

中国最古老的一本书《周易》上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易·系辞下》）这里的“书”字，当时是指“文字”而言，而把在甲骨、竹木版片上写刻文字以记事叫作“契”。书、契二字连起来成为一个词：“书契”，可以作在甲骨版片上写刻文字这一活动来解释，也可以作为一种完成了文字记录的实物来解释。当时，还只是在整块的个别甲骨、版片上写刻文字，这种“书契”还算不上是“书籍”意义的“书”。后来，文字的运用和生活内容日益丰富了，单独的甲骨版片已经容纳不了所要记录的内容，于是，发展出在好多块竹木版片上用文字前后连续进行记录。为了使阅读的人能够顺利地按次序阅读文字，便用牛皮条或绳子把多块版片串联了起来。到这时，这些串联起来的多块版片，才能算是有了“书籍”的意义。这里的“籍”字，在古代有多种不同的字义，只有和“书”字联缀成词时，才可作书册的意义解。古代汉字“册”是个象形字，篆体的写法就象是几块串在一起的版片。这个册字成了书籍的单位名称。成了册籍的书，其意义就大不一样了。《尚书·序》疏云：“圣贤阐教，事显于言，言愜群心，书而示法。既书有法，因号曰书。”这就说明，这里所说的“书”，是一种有系统性的著作了。

从以上情况，可以想见，我国古代从运用文字记录自然变化和社会活动，到把有文字记录的载体串联成“书籍”，有一个组合制作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不可能形成“书籍”，哪怕是最简陋的雏形“书籍”也不行。这个组合制作过程下的功夫就叫做“编”和“辑”。

对“编”这个字，《说文解字注》中说：“编，次简也，以绳次第竹简而排列之，曰编。”《字林》：“以绳次物曰编。”《玉篇》：“编，织也，

连也。”例如《史记·西南夷传》：“皆编发随畜迁徙。”《博雅》：“编，條也”。條是编结绳，作动词用意思就是组织、编织。新版《辞海》编字列有五个义项。一是：“古代用以穿联竹简的皮条或绳子。”二是：“交织、编结”，例：《楚辞·九章·悲回风》中“编愁苦以为膺。”三是：“组织排列”。四是：“编辑”，解释为“制作”之意。五是：“捏造”。这五个义项，有一个共同的意思，就是把有关的东西，按某种意图联结在一起。第五个义项“捏造”，其实也含有这个意思，比如把原来不相关的几个物质捏合在一起，以形成一种新的物体。而在思想领域里，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中，“捏造”常被称作“编造”。在理财工作中，也有“编造预算”这样的联词，不过，这里的“编造”不是那种有意陷人于是非（例如：编造谎话）的贬义词。

“辑”字，在《说文解字注》中有两种主要的解释，一“车輿也”，指车子上的輿而言，因为“輿中无所不居，无所不载，因引申为敛义。”一种是“和也”，即协调处理的意思。连接起来，可以理解为把几种事物集中起来加以整理协调。《六书故》：“合材为车，咸相得，谓之辑。”《玉篇》：“和也”。《康熙字典》：“又吐辞和好曰辑”，“又颜色和柔亦曰辑。”如《诗经·大雅》：“辞之辑矣”、“辑柔尔颜”。新版《辞海》列有六个义项。一是：“协调驾车的众马”，例如《列子·汤问》：“推于御也，齐辑手辔衔之际。”二是：“和睦”，例如《国语·鲁语上》：“契为司徒而民辑。”三是：“和同、齐一”，例如《汉书·晁错传》：“六国者，臣主皆不肖，谋不辑。”四是：“聚集”，例如《汉书·艺文志》：“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五是“敛”，解释为“拖着不使脱落”之意。六是“辑”通“缉”，“连缀”的意思。这“辑”字的六个义项也有一个共同的意思，就是把各自分散的事物整理成协调一致、互相联结的整体。

把“编”和“辑”的含义作一比较，可见既异而同。异在“编”字的含义偏重于把多种事物有意图有计划地串联到一起，而“辑”字

的含义则偏重于对串联的多种事物进行有条理的整理协调。同在哪里呢？同在这“编”、“辑”二字，都表明是一种阶段性的动态，或者叫做中间过程的制作活动。这两个字连成一个专用词以后，既有两个字复合起来的含义，又产生了新的更为宽广的意义。前者可以编辑图书为例，用现代的语言作最朴素的表达，那就是，有计划有目的地把含有内在联系的思想、素材、资料、文章等等整理加工成有逻辑性的著作物——书稿。后者的例证，最为明显的是，当现代图书编辑工作成为一项专业活动，从事这一专业工作的人员被叫做“编辑”之后，“编辑”就成为一种职业的名称和从业人员的专称了。

“编”和“辑”，实践早于概念

在我国古代，何时最早出现“编辑”这个名称？当最早出现这个语词时，是否就是现在我们所解释的这种意义，尚可研究。一般的说法，“编辑”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之初。例一，据《辞源》所载，引《唐大诏令集》中《颁行新令制》一文，有：“然以万机事广，恐听览之或遗；四海务殷，虑编辑之多缺。”例二，《颜鲁公文集》补遗《干禄字书序》有云：“若总据《说文》，使下笔多碍，当在泰山去甚，使轻重合宜，不揆庸虚，久思编辑。”例三：据唐初所写的南梁史书《南史·刘苞传》中说，刘苞“少好学，能属文，家有旧书，例皆残蠹，手自编辑，筐篋盈满。”这三例，“编辑”一词的含义都一样，主要是指文字整理工作而言。《刘苞传》中说得 clearer，刘苞把家藏的许多残破蛀蚀的旧书，显然都是手抄本，重新加以整理补缺校订，使之保存得更好。记载中把这一番功夫称为“编辑”。这是确切而中肯的。

北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翰林学士宋白向太宗赵光义进上《文苑英华》,“上览而善之”,诏曰:“近代以来,斯文浸盛,虽述作甚多,而妍媸不辨。遂令编辑,上取菁华。”这里的“编辑”一词,又进一步包括了比较筛选,择优去劣的意思。古代图书编辑工作所进行的组合制作功夫,至此也就大体上完备了。

然而,我国古代图书编辑工作,实际上在定名以前早就存在了。根据史料和考证,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删定古书《尚书》、《诗经》等六经,是中国古代图书编辑工作的发端。按这一说法,古代图书编辑工作比正式出现意义完备的“编辑”这一语词,要早1000多年。要注意,这里立论的根据在于先认定孔子删定的六经,是中国最古老原始的成型的书籍。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可是,我们认真地作一番考察,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实际存在的编辑工作,可以比正式出现意义完备的语词“编辑”早1000多年,说明实际上的图书编辑工作历史很为悠久,那么,为什么实际上的图书编辑工作定要在孔子删定六经之后才能算数呢?可能不可能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实际上的“图书”“编辑”工作了呢?由于我们研究的是实际上的图书编辑工作,这种编辑活动在古代起始时本来就比较简单,甚至从事这一活动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从事的是后来提出来的“图书”的“编辑”工作。然而,从“编辑”的古字意义上看,从古代的历史事实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孔子以前,也就是在《尚书》、《诗经》等六经问世之前,已经存在着原始的编辑工作。这一看法,和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发展的线索是一致的。

先以春秋时期孔子删定的六经中的两部书来研究。《尚书》可以说是一部我国上古时期历史文献和上古史迹记述的汇编。古字“尚”、“上”通用,因为这本书记述的是孔子之前的史实,所以定名为《尚书》。从这部书的内容看,历史学家说它是中国最早的一

部史书，文学史家则说它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散文集。两种看法都可成立。而从我们研究古代图书编辑工作的角度看，重要的在于这部书不是孔子的著作，而是孔子编辑而成的古籍。也就是说，是孔子经过了对许多史实材料的选择，按照一定的原则加以编辑合成的。被选编进这部书的史料只是已经存在了的史料中的一部分，必定还有一部分不符合孔子选编原则的史料被排除而不录的。可见，早在孔子编定《尚书》之前，就已经积累了远比《尚书》多得多的大量历史记载。《诗经》也是这样。在孔子编选《诗经》之前，古代中国的社会，从殷、周以来早已流传着许多传诵于口头或记录于文字的诗歌资料；而且，这些资料已不仅是一般性的口头传诵和文字纪录，而是相当成熟的诗歌体裁的文艺作品了。孔子的劳绩在于搜集这些分散在社会上的口头的和文字的诗歌作品，按照他的原则和看法，加以整理选择，把其中的一部分，编成了这部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史记》中说《诗》原有3000篇，孔子编定的《诗经》为305篇。就按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估计，古诗至少有3000篇，那孔子选定的不过是十分之一。如果司马迁所说的诗3000篇，是一个约估的概念，实际上比3000篇还要多，那么孔子选进《诗经》的作品连十分之一还不到。可见，孔子对选择编进《诗经》的诗歌作品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这一情况，也就说明了，孔子编辑六部古籍，花了很大的功夫。殷、周以来许多文字记载的资料，都是刻写在体积大而粗笨的兽骨龟甲和竹木版片上，仅仅收集阅读大量资料就是一件麻烦事，更何况需要四处跋涉、有心摘录、长途运送这些资料。因而，总结孔子编辑六经的实践经验，包括研究他对编辑六经所定的指导思想，是研究古代图书编辑工作的重要课题。

在孔子编定六部古籍之前，已经存在了原始状态的“图书”编辑工作，这一点，连孔子自己也不否认。孔子说他自己的宗旨是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仅从态度上说，可以有两点解释。（一）他表明他是编书，而不是创作；（二）他尊重他之前古人的成就。至于“述而不作”的意义，当作别论，另行研究。孔子是按这两种解释的态度去行事的。六经中《易经》的编辑更能说明这一点。《易经》原来是一本用阴阳学说和八卦图形的变化，来卜测人们处世行事、吉凶祸福的占筮书。《易经》的卦辞、爻辞都是西周初年的作品，距孔子编辑书籍时期已有五、六百年。到东周末的春秋时期，人们的知识和思维水平都提高了，把客观环境看成为一个由天道、地道、人道组成的大系统（混沌世界），认为支配这个大系统种种变化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一阴一阳。这种朴素的认识论，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进步。相传孔子因此而对《周易》作了哲学意义的系统解释，产生了彖体、象传、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十翼”的论述，定名为《易传》。这一说法究竟可靠与否，尚可研究。后来《易经》和《易传》合起来，称《周易》，成了孔子编成的一部古籍。但至少原来的《易经》那部分，是孔子之前就有的历史文化积存。孔子对这部分文化遗产的功绩主要是加以编辑成书。

考古工作提供的证明

我们还可以从考古工作者对古代历史文化遗存的发掘，以及对出土古文物的研究，得到重要的启示。

根据1926年河南安阳小屯发掘殷墟和后来不断的考古发掘所得，那些保存在墟穴里的甲骨、竹木简牍等版片，都是有着一定的次序，叠放在墟壁的一角，即“档案库”里的。不少文献资料编

次成册，好象是想让墓内主人能够顺利地阅读翻检这些成册的资料。象《尚书》所选载的《盘庚篇》的版片，在殷墟的库房里，分上、中、下三篇顺序排列，井井有条。足见当初把这批作品“殉”葬时，是经过了一番认真而细心的组合排列的。这一番工作为什么就不可以认为是原始的编辑工作呢？也许今天看来，这种组合排列并不复杂艰难，然而，在上古时代的水平上，如果没有一种可能还未自觉到，却已有动机与目的的“编辑”意识，怎么能使人们那么精心地准确地进行组合排列工作，而妥当地把殉葬“书籍”的众多篇章有序地安放好呢？

同样，从发掘出土的那些古代青铜器皿上的铭文来研究，众所周知，公元前1500年左右，黄河流域的商朝就已进入青铜时代，从而冶炼制造了大量的青铜器皿。在这些器皿上，和甲骨上刻写文字一样，也有许多与自然作斗争、反映社会生活的铭文。要在面积很有限的青铜器皿上留下有限的文字记录作铭文，事先不经过一番编辑成文的工作，肯定是不行的。显然，把铭文铸刻于器皿的技术活动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根据某一件器皿的形状和能够容纳多少文字的面积，来编写好有限字数的铭文。必须使铭文的长短、布局既能够反映所记录的内容，而又适合于这一件器皿所能给予的面积。对这一番制作功夫，不承认是古代青铜器皿这种特殊形态的“书籍”的编辑工作，恐怕是不合理的。

如果肯定考古发掘出来的古代历史文化遗存物上面的文字记载，应该被认为是原始的雏型“图书”的话，那么制作编定这些文字篇章，哪怕是一个或几个片段，都应该是经过一番“编辑”工作的。因而，中国图书编辑事业在古代的渊源，应该上推到三千多年以前，至少要比孔子编定六经之前要早好多年。虽然这种原始的“图书”编辑工作，在长时间里确实是相当简单，但当我们考虑到上古时期的种种限制，包括使用的文字很少，载体材料的制作困

难,人的思维水平还不高等等主客观条件,那么,对于古人能在那样的条件下,从事原始的编辑活动,就会给以承认和得出恰当的评价了。

可见,从中国图书编辑事业有着这么悠久的历史来估计,认为图书编辑事业无“学”可言,或者没有什么规律性可寻,是不科学的妄断。

历史悠久,必然是积藏丰富

当然,历史悠久不能说明全部问题。西方许多文明古国同样历史悠久,但由于国家发生了断裂性的变化。在国家的消亡兴替之中,民族文化也出现了中断的现象。中国则不然。中国的古代传统文化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延续地发展,没有中断过。图书编辑事业和出版事业一样,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延续发展了几千年,不但从未有过中断现象,而且越来越发展得繁盛而成熟。这就使中国古代的图书编辑事业,为国家和民族积存了极其丰富、极为深厚的图书库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宝藏中,这个几千年的图书库存闪烁着光辉灿烂的异彩,不仅是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文化瑰宝,也是世界人类文化宝藏中极为珍贵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在悠久而不断延续的历史进程中,图书编辑对我国图书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就更不用说了。恐怕对此作出任何高度的评价,都是不会过分的。可以说,在中国,没有持续地延续了三、四千年,在古代很早就出现的图书编辑事业,也就不会有持续地延续了三、四千年之久的图书出版事业,也就

不会有四、五千年长期保存、积累起来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将使我们更有根据确信中国的图书编辑事业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其中必有相应的规律性。

《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的第一部目录学作品，上面所列的书籍类目，起自春秋战国，下限只到西汉初年为止，分为6略，38种，595家，共13269卷。在这统计之前，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损失的图书还不计在内。在这一目录中，《文艺》有103家，3123篇；《诸子》有189家，4324篇；《诗赋》有106家，1318篇；《兵书》有5家，790篇、图43卷；《数术》有190家，2528卷；《方技》有36家，868卷。凡称篇的是简牍，凡称卷的是帛书。从这一统计，可见春秋战国以后大约500年中间，我国的图书编辑出版事业达到了何等巨大的规模！其中，《诸子》是指在学术理论上自成一派的各家著作，竟达189家，共有4000多篇，加上《文艺》103家，作品3000多篇，共占全部积累的60%。自然科学方面，《数术》和《方技》加起来200多家，共有3000多篇卷。在古代中国正式图书的初创时期，就有这样的成就，是任何国家都难以与之匹敌的。要知道从孔子在世的春秋时期到西汉初年，中国的全国人口大约在2000万左右，竟能在图书编辑出版事业上取得如上所述的巨大成就，实在令我们后人惊叹。

西汉以后到中世纪盛期的隋唐，在雕版印刷技术发明以前，中国古代的图书编辑又有更大的发展。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从西汉到隋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止，大约又经过800多年，登入目录而积存的图书，达到了14466种，89666卷。以卷数计，比《汉书·艺文志》的登目数增加了6倍多。这个发展速度不能不说是相当快的。

到唐代中叶，在雕版印刷技术已经推行多年的情况下，图书印制数量和品种都大大地增加了，图书的出版周期也大为缩短。